

古人寫作新書的另面思考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| 張家榮

圖籍是文明進化的產物，物質性的外表下，內在蘊藏的精神與生成脈絡，更值得吾人去挖掘。古代中國，在數量龐大的文人群體努力下，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圖書。這些圖籍的生成方式如果從內容來看，一般可分為「著作」、「編述」與「鈔纂」三種。「著作」類作品，前無所承，全憑原創思考撰成，如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。「編述」類作品，將已有的著作內容，運用新體例改寫以符合需要，如《呂氏春秋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。「鈔纂」類作品，直接鈔錄原作，僅做排比分類，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通鑑紀事本末》。

而寫作方式有難易之分的圖籍，內外都有「主動」、「被動」的生成因子。「主動」與「被動」寫作都有目的性，如同詩人因興發而賦詩，學生為課堂而創作。「主動」的寫作，可以很容易掌握到軌跡，而「被動」寫作，牽涉的因子曲折，生成過程不甚明朗；「主動」的寫作，如同直下的河水，「被動」的寫作，猶如石頭入水後激起的連鎖效應。

從原始到文明，人們的物質需求被滿足，精神的渴求則持續提高。漸漸的，傳播知識的圖書成了「人類社會的高級消費產品」。(注1) 這個必需品大部分掌握在文人手裏，雖然他們也有程度的不同，但都具備有寫作能力則不容否認。所謂「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」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一些出於「門戶之爭」的作品創作出現。這當中，有些僅逞口舌之辯，有些則因「對立」理論之激盪而成經典。如果說，有所謂推動圖籍生產的加速器的話，「對立」之論證一定是效能最高的。

有圖籍的早期，圖籍產生可以獨立自主，但由於人與人的交往日趨緊密，知識的傳播也更發達，創作過程中也就或多或少摻入了外來成分。就像莊周，他本來可以自在談論逍遙之樂，但因有惠施的加入，竟產生有趣的發酵，而這「濠梁之辯」，也使《莊子》更加引人入勝。

中國圖書史上，因為「對立」而產生的圖籍文獻有著不單純的原因，很多現象與結果，並非純用「意氣之爭」就可以解釋。相反的，現象的背後其實有更複雜的文化、社會因素，很值得吾人探究。以下試舉幾例說明。

* 鄭玄對何休的「入室操矛」

鄭玄（127-200）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，東漢經學家。早年曾經當官，後因志趣不合，於是入太學學習今文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與《三統歷》等。又師從張恭祖學《古文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韓詩》等，後師事扶風茂陵人馬融（79-166）習古文經學。遊學十餘年歸里講學，弟子人數達百千人，後因黨錮牽連，隱居潛心學術，並遍注群經，遂博

通今、古。鄭氏有心於「述先聖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」，所著以古文經為主，兼採今文經，除集漢代經學大成，更結束了歷時兩百餘年的今、古文之爭，歷來有「鄭學」之稱。

何休（129-182），字邵公，任城樊人，東漢經學家。何休為人質樸而雅有心思，鑽研六經頗有心得，對「三墳五典」、「陰陽五行」、「河洛易經」等領域皆有獨到見解。天生口訥不擅言詞，門徒有發問者，則用以書面作答。曾詔拜郎中，因不合志願，以病請辭。後因黨錮事牽連遭錮，之後閉門不出，苦心撰成《春秋公羊傳解詁》。《公羊傳》是漢武帝獨尊儒術所採用的重要經典，而《春秋公羊傳解詁》則是此學到東漢的總結之作，此書保存公羊學的許多條例與義旨，成為後世公羊學者的必讀經典。

何休長於天文曆算，與老師羊弼追述前人說法，集中攻擊《左氏》和《穀梁》之缺。曾著《公羊墨守》，論公羊家之春秋說，如墨子守城般無法攻破；又作《左氏膏肓》，點出《左氏春秋傳》的很多問題，像人病入膏肓般不可醫；更著《穀梁廢疾》，指出《穀梁春秋傳》問題重重，像人病倒殘廢，無法復原。史稱這三部書為「三闕」，亦即理論幽微難通，猶如三座高不可攀的宮闕。稍後，鄭玄乃作《發墨守》、《鍼膏肓》、《起廢疾》猛力還擊。何休看了也不免嘆服道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，以伐我乎！」

如同《後漢書》之評論鄭玄：「自秦焚六經，聖文埃滅。漢興，諸儒頗修藝文；及東京，學者亦各名家。而守文之徒，滯固所稟，異端紛紜，互相詭激，遂令經有數家，家有數說，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，學徒勞而少功，後生疑而莫正。鄭玄括囊大典，網羅眾家，刪裁繁誣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學者略知所歸。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，而長於玄，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。及傳授生徒，並專以鄭氏家法云。」（注2）確實，鄭玄與何休兩人的學術互動，除了成為「入室操戈」成語之典故，也象徵古文經學的開始獨盛與今、古文的匯合融通。

* 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與毛奇齡《古文尚書冤詞》

閻若璩（1636-1704），字百詩，號潛丘，山西太原人。曾問學於黃宗羲（1610-1695），並有關於《尚書》的問答筆記傳世。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游京師，尚書龔鼎孳（1615-1673）重才為之延譽，由此知名。

後歸太原故里，遇顧炎武（1613-1682）游太原，以所撰《日知錄》相問閻氏，改訂有數則，顧氏亦嘆服之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應博學鴻儒科不第，再留京師，先後與汪琬（1624-1691）、徐乾學（1631-1694）等討論禮學經義，並參與徐乾學主持的一統志修撰工作。閻氏一生研究經史，著述宏富，撰有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、《四書釋地》、《釋地餘論》、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、《潛邱笱記》與《困學紀聞箋》等。

毛奇齡（1623-1716），字大可，又名甡，號初晴，以郡望稱西河，人稱西河先生，浙江蕭山人。四歲時，母親口授《大學》即能背誦無誤，受推官陳子龍（1608-1647）推薦補為諸生。明亡哭於學宮三日，避亂築室讀書於城南山中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薦舉博學鴻儒科，授翰林院檢討，

並充《明史》纂修官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任會試同考官，後得痺疾，遂隱居杭州，潛心著述不復出。毛氏為清初著名學者，於經學、史學、詩歌方面皆頗有造詣，著述等身，著有《古文尚書冤詞》、《春秋占筮書》、《四書改錯》、《仲氏易》、《家禮辨說》、《古今通韻》與《白鷺洲主客說詩》等。

閻若璩二十歲時研讀《尚書》，開始懷疑所謂二十五篇《古文尚書》的真假，歷經三十餘年的努力，撰成了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。該書不僅是《古文尚書》辨偽的總結性作品，在史料鑒別學上更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。他在「以虛證實，以實證虛」的考證原則下，列舉了一百二十八條證據（其中有目錄無內容者十二條，目錄內容皆缺者十七條）辯孔安國所傳《古文尚書》之偽，不僅旁徵博引且論證嚴密，終使《古文尚書》之偽託成為學界定論。

毛奇齡的學術個性，史稱其：「淹貫羣書，所自負者在經學，然好為駁辨，他人所已言者，必力反其詞。《古文尚書》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偽，及閻若璩作《疏證》，奇齡力辨為真，遂作《古文尚書冤詞》。又刪舊所作《尚書廣聽錄》為五卷，以求勝於若璩，而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，奇齡又以為戰國之書。所作《經問》，指名攻駁者，惟顧炎武、閻若璩、胡渭三人。以三人博學重望，足以攻擊，而餘子以下不足齒錄，其傲睨如此」。（注3）證據就擺在眼前，毛奇齡雖千方百計想要與人爭勝，但自然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。

總之，《古文尚書》之偽已成定論，由於毛氏陷於過份迷信《古文尚書》與自身個性的偏執，最終導致結論錯誤。對此吾人亦能得到一些啟發：1. 無論從篇章字句還是典章制度尋找證據，毛氏的方法與閻氏等人沒有分別，這代表清初考據學風已萌其芽。2. 不論從閻氏本人的愈加審慎，或此事件所激起的學術風潮，都顯示出學術界的糾謬風氣，實有助研究的持續深入。而這也是稍後乾嘉考據學術興起的背景之一。

* 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與方東樹《漢學商兌》

江藩（1761-1830），字子屏，號鄭堂，又號水松、節甫，江蘇甘泉人，少為監生，曾主講麗山書院。繼而先後受業於江聲（1721-1799）、余蕭客（1732-1778）等，得漢學大師惠棟（1697-1758）之傳。又曾被阮元（1764-1849）延攬協纂《廣東通志》。其人博通經史，旁及百家之學，尤通訓詁、考據之學，著述種類豐富，主要有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、《周易述補》、《炳燭室雜文》、《半甌齋題跋》、《伴月樓詩鈔》與《扁舟載酒詞》等。

方東樹（1772-1851），字植之，晚號儀衛老人，安徽桐城人。諸生，幼承家學，初頗致力心性之學。又學古文於桐城派姚鼐（1731-1815）。中年以後，為學首重程、朱義理之學。曾遊歷廣東，作《匡民正俗對》陳述刺吸食鴉片之弊。其人博極群書，但終老不遇，著作有《漢學商兌》、《書林揚鱗》、《昭昧詹言》與《儀衛軒文集》等。

當然，江、方事蹟最為後世所曉者，為各有心思的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與《漢學商兌》之撰作。

討論此事件前，先說明兩人所屬陣營之異同。江藩擁立所謂「漢學」，方東樹則為「宋學」門徒。中國學術史上，漢學、宋學之分野，始自清代。所謂「漢學」，係針對兩漢學術思想主流來談，主要指兩漢經學，包括西漢今文經學和東漢古文經學；漢學與宋學相比，漢學更著重儒家經典的註釋和訓詁，亦即務實不尚空談，但有脫離現實，煩瑣考據的流弊。所謂「宋學」，是指宋、元、明時期學術思想的主流而言，主要指宋、明時期的「性命義理之學」或「宋明理學」，包括以二程、朱子為代表的「程朱學派」和以陸九淵、王陽明為代表的「陸王學派」；相對於漢學，宋學更加注重義理之闡釋致用，亦即重褒貶議論，旨在發揮。

本來，清代理學沿宋明理學腳步而來，理應持續昌盛。回顧歷史也可見，不僅清初諸帝皆崇理學，康熙皇帝更提昇朱熹（1130-1200）在孔廟中的地位，並頒行《朱子全書》，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為科舉考試的範本。由此，程、朱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和學術主流。然而，到了乾隆年間（1736-1795），因發展環境不利（如理學名臣的沉淪）與考據學術的興盛，理學逐漸衰退，之後的一段時間，考據學（漢學）的獨盛則人盡皆知。

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漢學大老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出版，考辨學術源流，分經學為漢、宋兩派，既道盡傳授淵源、區別漢宋門戶，也使漢學一派儼然名門。稍後，道光六年（1826），《漢學商兌》成書，內容自然純為宋學辯護，同時不忘猛力攻擊漢學。總之，姑且不論孰是孰非，重點是，二書一前一後，一漢一宋，各為其主也各有影響，而吾人觀察這所謂對立，則能嗅得清代學術與社會現實的演變脈絡。

現代學者對此多有關注，史學家朱維錚曾云：「同江藩一樣，方東樹也沒有想到，他們從正負兩面評論清代漢學，主觀意向都在於『打擊別人，擡高自己』，結果卻殊途同歸，恰好從兩個極端，凸顯了所謂漢學和所謂宋學，早在十九世紀初葉，早在「歐風美雨」大舉從海上侵襲帝國大陸前多年，便都已走向末路。」（注4）所謂「末路」僅道出總體趨勢，漢、宋餘火則未曾熄止，這是他對清代學術的另面思考。此外，史學家王汎森則有不同的觀察面向：「方東樹代表道光年間一大批希望轉弦易轍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。他們都不滿意當時學問的性質以及學問與社會的關係，他們想追求一種理想的人格，簡言之，一種整合政事、文章與道德為一的整體觀念。……這一個將文明發展之注意力由漢轉向宋的方向，是清代後期思想史中一個關鍵性的變化。」（注5）雖說兩部作品皆起了不小漣漪，但緩慢變革間的思想醞釀亦值得探討。

注釋

1. 程煥文，《中國圖書文化導論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39。
2. 南朝宋·范曄撰，《後漢書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），卷三十五〈鄭玄傳〉，頁1212-1213。
3. 趙爾巽等撰，《清史稿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），卷四百八十一〈儒林傳二〉，頁13176。
4. 朱維錚，《漢學師承記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98），〈導言〉，頁4。
5. 王汎森，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3），頁5。